

孙旭培著

新闻学新论

当代中国出版社

新闻学新论

孙旭培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学新论 / 孙旭培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7

ISBN 7-80092-300-2

I. 新… II. 孙… III. 新闻学—研究 IV. 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6473 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北京大兴包头营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25 印张 320 千字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7.00 元

新闻学新论

邵美泽题



序 言

孙旭培同志把他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成果结集出版，定名为《新闻学新论》，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确需要有新论。

我二十多岁在上海开始做新闻工作，到六十多岁在北京离开新闻工作岗位，从事新闻工作凡四十多年。经历了两个时代——解放前和解放后。当过报刊的主编、总编辑，还当过几年新闻局长。可以说，尝到了新闻工作的酸甜苦辣。在解放前，我们钻国民党对新闻管理的空子，办公开的报刊和广播电台，传播革命真理，报道人民解放事业的消息。这样做，是要冒被杀头的危险的。就在上海解放的前夕，好几位优秀的新闻战士，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甚至已经听到了解放军的枪声，却只能在地下含笑迎接人民的解放。我有幸逃脱国民党的虎口，得以在解放后继承先烈的遗志，继续从事人民的新闻工作。在新中国，当然是换了天地。人民取得了前辈们流血牺牲长期奋斗的新闻自由，历届宪法都写明要保障人民言论出版自由。但是新中国并不是世外桃源。由于政治风云变幻，也由于新中国还始终没有一部完整的新闻法，而新闻工作者又总是处在政治最敏感的风口浪尖，新闻工作者动辄犯律，以至有“当总编辑没有好下场”的说法。1957年反右派政治运动中，就有不少新闻工作者因为直言说真话而被划为“右派”。我在1958年，也被划为“右派”，罪名之一就是作为报社领导，我曾主管过《中国青年报》的讽刺性副刊《辣椒》。

究竟是些什么问题，曾长期困惑着我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主管新闻工作的党的领导呢？我想主要是这样一些问题：

一、究竟怎样看待批评？新中国初期，中共中央曾多次发出指示，必须重视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还一再批评只报喜不报忧的现象。但是几十年来的实践说明，要贯彻这样

的指示，总是困难重重。批评者，曾被认为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甚至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那种给批评者乱扣帽子的现象虽然少了。但是开展批评的阻力，却有增无减。不光被批评者抵制批评，就连被批评单位的上级往往也阻挠批评。记者写了一篇批评报道，常常是引起打不完的官司。如果是地方记者，记者在当地就日子难过。再说，现在许多记者、编辑又因正面宣传为主的理由，对开展批评不是“噤若寒蝉”，就是“绕道而行”。

二、究竟怎样看待报纸上（包括其他媒介）的不同声音？

传达党的声音是党报的宗旨和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报纸和其他新闻媒介就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与此同时，党一贯重视人民的呼声和意见。毛泽东并且从认识论和领导方法论的高度强调倾听人民意见的重要性。指出，正确的思想不是少数领导人脑子里固有的，而是从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来；正确的领导方法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毛泽东还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主张凡事都“舆论一律”。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党中央的批文中明确指出，不要求《人民日报》刊登的内容都是代表党中央的，允许报纸上刊登不同的意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文件中曾指出，报纸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要经人民讨论”。但是在实践中，要真正做到“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却是很难。“文革”中，各家报纸每天要对版面、对标题，不断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以至“千报一面”，全国一个声音，“万马齐喑”，当然是登峰造极了。粉碎“四人帮”后，思想大解放，舆论也大为活跃。但是报纸上还是很少看到人民群众有重大意见发表，很难看到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居多的，还是一种声音，一面倒。这常常是习惯力量使新闻工作者按老规矩办事。谁都怕沾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边。

三、新闻的功能是否就是宣传？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把新闻

与宣传连在一起说，称之为新闻宣传。这并不奇怪。因为在革命时期，党创办报纸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革命思想和主张。建国以后报纸和其他新闻媒介继续担负着宣传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重任，在今后长时期中还将是这样。但是因此而新闻功能的认识局限于宣传，就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首先，人民群众对新闻媒介的第一位要求是提供新闻和信息。这里当然也包括着党和政府新的方针政策、新的主张、新的解释等的新闻和信息。商品经济越发展，改革开放越普及，社会越现代化，人民群众对了解全国和全世界新闻、信息的要求就越高。如果我们对新闻的知识局限于宣传，只从党的宣传要求、宣传价值来选择新闻和信息，那么新闻媒介能够提供的新闻、信息面必然是很窄的，就会在实际上造成新闻封锁，使人民群众耳目闭塞。这是不符合党的关于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的。再说，我们在宣传上的思维方式，又习惯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对一切都要贴上是非的标签，而在当今世界每时每刻出现的各种各样新闻中，有许多是很难或者一时很难分清是非的。要求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有鲜明的立场观点，其结果或是造成新闻报道面过窄，或是一时判断片面甚至错误。在客观上，这样做还在国内外形成一种印象，把新闻报道的每一句话，都看成是党和政府的态度。这样就大大束缚了我们新闻报道特别是国际新闻报道的手脚。对现代的受众（读者、听众或观众）来说，他们并不总是欢迎贴上标签的新闻报道，而愿意自己去作出判断。他们对新闻媒介的要求是提供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当他们从国内新闻媒介不能满足时，一些人就转向从外国电台求得新闻来源，以至曾有一时间短波收音机脱销。面对这种现象，作为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工作的主管者，难道能不深思吗？在当今通讯传播技术极为发达的世界，地球某一角落发生的事情，全世界电视当天就能看到实况。世界变得越来越开放了，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我们守着陈旧观念，怎能在世界剧烈的新闻竞争中，争得作为十一亿人大国应有的地位呢？

四、怎样看待新闻单位的自主权？ 新闻单位，作为企业，

必须有经营权；作为舆论工具，必须有监督社会公仆的言论权。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十分重视报刊的自主权。而我们传统的作法是把新闻单位作为党委和政府的一个部门。干部由上面派，经费由上面拨，宣传要求由上面定，稿子由上面审，甚至有的党委部门还要审阅大样。印出来的报纸由公费保证订阅。这样，新闻单位很少有自主权。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守着铁饭碗，吃着大锅饭，也心安理得。因为我们认为，官是代表人民的。官民是一致的，一切听从领导指挥，是天经地义的。只是报纸办得缺乏生气，办的是官报，说的是官话。与人民群众之间，总是隔着一层。1957年，毛泽东就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空前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并不是铁板一块，还存在着种种内部矛盾。官和民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毛泽东号召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由于新闻单位对官的依附性，缺乏自主性，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新闻媒介除了充当党委和政府部门的喉舌、说官话外，就很难发挥新闻媒介特有的多方面的功能——耳目、监督、排气阀、对话交流等。由于怕戴上要当“无冕之王”、“闹独立性”、“不要党的领导”、“自由化”的帽子，新闻单位一般也忌讳谈自主权的问题。

五、怎样看待新闻改革？ 在我国所有的各项改革中，新闻改革几乎是提出最早的。这些年来，新闻改革的实践的确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新闻改革的口号却时响时弱，甚至有一个时期人们不敢提新闻改革，而只能说改进新闻工作。于是有的人就采取了“只做不说”的态度。就是在新闻改革的实践上不停步，一点一点地把门缝挤大，使既成事实让大家慢慢地习惯接受，而不求在新闻理论上提出什么新的观点。这样做，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新闻实践没有理论的指导，既迈不开大的步子，一遇风浪又会摇摆。已取得的成绩也就难以巩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说穿了，还是由于思想上存在着种种顾虑。如：提倡新闻改

革会不会否定党的新闻工作的传统？经济改革可以引进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机制，新闻工作是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新闻改革难道也要把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引进来吗？对这样一些严肃的问题，的确需要作出认真的回答。1957年，毛泽东对新闻工作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是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尽管对这个论断，今天还有争议。但是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即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今天，当我国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我国的新闻事业也必须相应进行变革。这就是我国新闻必须改革的根据。不进行新闻改革，我国新闻事业就不能有效地为我国的经济基础服务，就不能有效地参加当今世界的新闻竞争。

我们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新闻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因此首先要认真考虑我国的新闻工作传统，有哪些是符合我国当今的实际是应该坚持的；有哪些已不符合当今实际而应该变革的。我们必须从中国当前的实际来进行新闻改革，因此须着眼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实际，有步骤地进行新闻改革。同时，新闻改革自然也要借鉴和引进国外新闻工作先进、成功的经验。现代的报纸、广播、电视、通讯卫星等原本都是舶来品。西方可以利用中国古代几大发明的成果，发展了资本主义。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呢？这些文明成果当然不仅仅限于科学技术方面，就说社会科学，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创造人类在十九世纪那些优秀成果的学者都不是属于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却“直接继续”这些学说，创造了完整的科学世界观。正如列宁所指出：“在马克思主义里绝对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今天，难道我们能够因为惧怕资本主义，就固步自封、僵

化不变，拒绝人类在二十世纪创造的优秀成果（包括新闻传播学的成果）吗？

上述种种问题，长期以来所以使我们困惑，使我们苦恼，使我们吃足苦头，使我们摇摇摆摆，使我们的新闻事业不能取得应有的更大成果，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新闻理论落后于新闻实践，我们还缺乏一套科学的、完整的、符合当今现代化建设要求的社会主义新闻学。要解决好上面那些问题，当然也不能仅仅靠新闻事业本身，而有赖于我国各项事业的同步发展，首先是贯彻党的“十四大”的精神，“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而新闻事业，又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因此，我们新闻工作者要加倍努力。不仅是在实践上，努力把新闻改革的门缝挤得大些，而且要努力在新闻理论上进行探索，创造能够指导我们实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我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大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的各项事业都在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我国的新闻事业首当其冲。首先是出现了报纸和各新闻媒介互相竞争的十分活跃的局面。“报竞人择”，越演越烈的“发行大战”，清楚表明了这点。受众选择新闻媒介的自主性越来越强，公费订阅的比例日益下降，靠吃公费的大锅饭已经越来越不行了。新闻产品一经转入市场竞争，从管理体制到产品内容都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才能适应竞争。适者，就生存、发展；不适者，就衰落、淘汰。为了适应竞争，许多新闻单位从事业性转为经营性。在经济上逐渐摆脱了对财政补贴的依赖，走向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这种经济的变化，说明“毛”与“皮”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其影响将是深远的。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出现了多种经济成份，社会上出现了不同经济利益的集团。新闻媒介的“毛”，又将附在哪张“皮”上呢？过去是党指挥新闻，而目前那种令人担忧的所谓“有偿新闻”的发展趋势，会不会

造成“钱指挥新闻”，谁出钱就为谁宣传，新闻舆论掌握在某些经济大腕的手里？在这种变革的形势下，党和政府又如何有效地保证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和管理，社会又如何正确地对新闻事业进行制约，使新闻事业在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和壮大？几十年来逐步形成的、我国目前的这种按行政区域和行业划分办报的条条块块分割的报业结构，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的客观规律？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新闻理论作出回答。我国的新闻事业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需要理论。新闻改革呼唤新闻理论。

现在大家知道，外国都在看好中国的商品市场，认为中国是二十一世纪潜在的世界最大的商品市场。可能人们还未注意到，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新闻市场。在经济文化发展起来后，将有十二亿人口的中国对新闻需求的潜力，真是无可限量的。现在围绕中国大陆，有几十个外国电台昼夜不停地对中国播放。外国的电视通过卫星接收天线数量不断扩大而悄悄地进入中国家庭，外国新闻记者在中国穿流不息。许多外国的新闻媒介都想介入到中国来。

我们处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伟大的国土上，应该创造出世界上最好的新闻事业，应该为当代世界的新闻学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有一些同志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学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如最早提出报纸的商品属性、“社会需求论”的王中教授等。遗憾的是，主要由于政治的原因，一些探索还只停留在思想火花，而其本人已垂垂老矣。感谢我国改革的伟大设计师邓小平的英明，使后起之秀，像孙旭培这样的中年学者，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写出一篇又一篇有独到见解、有深度的优秀新闻学论著。我们的确从心底里感到欢欣。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力作，有更多的优秀的新闻学学者出现。

钟沛璋

1992年岁末

自序

若以蔡元培先生1918年创办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作起点，中国新闻学发展迄今已75年。其间，中国新闻学搬用过西方的体系，也搬用过原苏联的体系。历史证明，照搬照套外国，不适合于中国国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新闻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代，新闻学研究也日趋活跃，新的新闻学体系开始孕育。我就是这样的时机开始新闻学研究的。十几年来，我另辟蹊径，从探索作为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中的表现的新闻自由开始，继而研究作为界定新闻自由的规范的新闻法，然后在新闻自由与法制的总构思下研究新闻改革，并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新闻写作、报道等实务问题作了新的探讨。我还花相当多的精力，研究了中国新闻事业40年的发展历程，研讨其功过得失。

对于新闻学的发展来说，我的探讨是初步的，甚至也许还有点幼稚。但国内外一些同行认为，我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1992年3月，香港《信报》发表一位美国传播学者评论大陆和香港、台湾三地的新闻学术的文章，说“孙旭培先生……利用马列斯毛的经典著作作为新闻改革奠下理论基础，可谓新人耳目，他在未来的改革岁月中可望成为重要的理论旗手”。这后半句话，我愧不敢当。我的功底很浅，探讨中的错误不会少，不敢让很不成熟的东西去影响改革大业；但前半句，确乎有点真，由于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指导下，采用新的思路和论点，似可新人耳目。所以，我将这本集中了我十多年来的一些主要的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定名为《新闻学新论》。因其新，读者值得一看，因其新而稚嫩，读者诸君无须全信。抛砖引玉，引起思考和讨论，为新的新闻学体系的确立添砖加瓦，才是本书出版的目的。

我国进行新闻学研究的人不算少，出的书也很多，但多为采、写、编等实务研究。而我主要是作宏观的理论研究、新闻制度研究。多年来，我就有一个感受：这门学问很不容易做，风险颇多，

有时甚至感到，发现表达真理的方式比发现真理本身还难！理论研究一是为总结和指导现实，二是为分析和预测未来。未来是现在的延长，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的研究侧重于未来和改革，是新闻学中的“未来学”。因此，多数研究成果都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甚至包括本书中一些过去未公开发表，尚在进行内部交流的成果，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同志用审阅明天见报稿件的眼光，用与新闻主管部门下发的有关文件进行核对的心态，来看这些研究成果，自然有时不免很不以为然，甚至要求查一查。因此，这些成果的后面常有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故事。这也许是由于新闻很敏感，他们不希望因为研究未来而影响了现在，自有可以理解的一面。但是，社会科学研究不分析和预测未来，就成不了科学，实践发展也没有科学的方向。可令人欣慰的是，由于这些研究是伴随着改革一起往前走的，几乎每一篇都与改革息息相关，因而与我观点认同者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更会是这样。

中共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把新闻改革的基础和前提更加醒目地提到新闻业面前。我的“超前研究”，原来提前量较大，现在一下子缩短了，许多原来只是设想，现在立即可以做了。欣喜之余，我又匆草一篇《刍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业》，置于卷首。

收入本书的论文都在文末注明过去发表的年月。但《中国新闻事业四十年》因为没发表过，注的是完稿的时间。《百家争鸣的实现与社会科学的发展》用的是发表前的小样稿，注的是小样稿的时间。

最后，我感谢邵华泽同志挥毫为本书题写书名，感谢钟沛璋同志为本书作序，感谢筱逊同志为本书出版所作的努力。

孙旭培

1993年1月

目 录

序言	钟沛璋 I
自序	K

卷首篇：当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新闻业	1
---------------------------------	---

1.新闻自由

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	17
一、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产生和发展	24
二、怎样评价资本主义新闻自由	30
三、无产阶级为争取新闻自由而斗争	39
四、苏联新闻模式探讨	45
五、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启示	56
六、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基本特征	63
七、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若干表现形式（上）	72
八、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若干表现形式（下）	85
九、新闻的法治与党对新闻的领导	97
十、新闻自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108

百家争鸣的实现与社会科学的发展	118
传播结构与领导层的信息结构	125

2. 新闻立法

宪法是我国新闻事业的指针	131
新闻立法纵横谈	136
舆论监督与新闻法治	144
新闻工作者与新闻纠纷	150
从新闻立法途径保证新闻真实性	161

3. 新闻改革

新闻改革之管见	173
论新闻观念的更新	182
新闻体制改革略议	194

4. 新闻理论与实务

谈报纸性质的命题	203
“本质真实论”剖析	210
我想到了拉普拉斯决定论	223
论新闻写作模式的改革	228

论新闻报道的平衡	236
力戒不负责任的放言高论	249

5. 当代中国新闻事业

中国新闻事业四十年	255
第一章 在全国范围内创建人民的新闻事业	255
第二章 新闻事业稳步发展时期(恢复经济和社会 主义改造时期)	264
第三章 新闻事业蓬勃发展和酝酿改革(一九五六 年前后)	280
第四章 新闻事业优良传统屡受破坏(整风、“反 右派”至“文革”前夕)	290
第五章 新闻事业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时 期)	308
第六章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创造新鲜经验(顶着压 力拨乱反正时期)	319
第七章 新的历史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	325
新时期十年中国新闻媒介的功能与运作	342
中国报刊的现状与展望	354

卷首篇

刍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业

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了一个以发展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伟大的时代，新闻业将呈现什么样的面貌，新闻理论和实践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在经历过10多年新闻改革的今天，更加有可能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由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业的运作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本文在这里也只能谈一些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不够成熟的看法。

一、新闻业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1957年5、6月间，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

“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毛泽东还批评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说“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须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这些论断，几十年来一直是作为我国新闻学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的论断说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植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且是为它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仍要看到它的正确性。因为宪法就规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肯定新闻业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一回事，新闻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服务形式，新闻媒介应该具备何种风